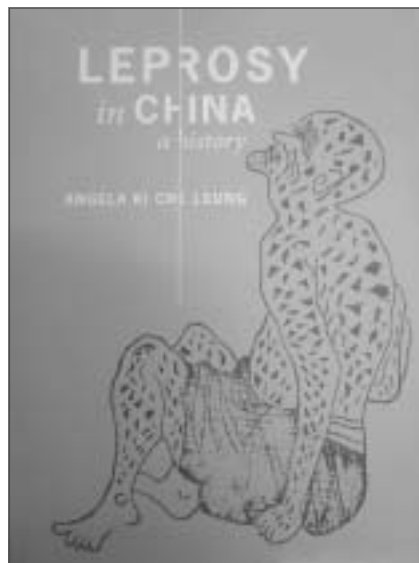


## 世界史視角下的中國醫療史

● 布琮任



梁氏指出，癩病不僅是生物醫學上的傳染性病類，它在不同時空下亦富含一定的文化特色：它可以是落後文明與劣等種族的標誌，也可以是進入「先進文明」的「典型」惡疾。

Angela Ki-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自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蒲立本 (Edwin G. Pulleyblank)、王賡武等學者相繼強調人類歷史應放置在同一時空作出比對與分析後，利用「世界史」(global history) 思維管窺中國各式各樣的歷史專題，已逐漸成為近年來的學術熱潮。事實上，世界史論說所強調的「宏觀視野」、「區域整合」與「種族平等」(Pamela K. Crossley, *What is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2008], 1-10)，的確為不同

國家的通、專論研究增添無比活力與色彩。梁其姿的《中國癩病史》(作者暫譯，*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引用只註頁碼)便是希望利用這種態度，透過漢生病 (Hansen's Disease，又作麻瘋病、癩病，以下一律稱「癩病」) 在中國的起源、流播與發展，重構一部摒棄以西方「先進科學」為中心、且從世界史視角出發的中國醫療與疾病史。

有別於傳統的癩病史研究，梁氏除了概述癩病在中國的起源與傳播脈絡外，亦分析了癩病在全球化論述中的意義，以及它在醫療文化史上的位置。梁氏指出，癩病不僅是生物醫學上的傳染性病類，它在不同時空下亦富含一定的文化特色：它可以是落後文明與劣等種族的標誌，也可以是進入「先進文明」的「典型」惡疾。

比如歐洲殖民者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堅船利炮打進亞、非、美洲等國度，他們隨之發現在歐洲大陸以外的世界，也存有在黑暗時代 (Dark Age) 早已出現的癩病病例；在他們的視角下，癩病便成為人類社會從野蠻漸進到文明過程的表象，殖民主義彷彿為癩病添上一種判別種族標準的負面色彩。及至二十世紀中葉，時人雖然對癩病加深了理解和認知，但癩病作為牽涉醫學論述、身體政治 (body politics)

與宗教關懷的文化研究對象，它與社會權力、文化霸權和知識發展的關係依然難以分割。所以，觀乎癩病在中國自古至今的流播軌迹，實有助我們了解疾病、權力與知識三者的互扣情況。

誠然，幾乎任何一個群落、部族與國度都需要面對與自然環境有關的問題；而疾病便是人類和自然接觸以後的必然產物。因此，疾病流播不僅是區域性的個別現象，亦可能發展成為一種破壞力駭人的全球危機。由於疾病是一種無區域、無種族、無障礙的機體問題，不同群體在面對危機時大多會苦思解決疑難的出路；在苦思的過程中，他們不免會追溯問題的根源。按照拉崗 (Jacques Lacan) 的鏡階理論 (The Mirror Stage [le stade du miroir])，人類在找到問題源頭後，他們大多會以「文明」和「落後」來展現「我者」、扭曲「他者」；這些「非我性」的界限便製造出一系列「種族分野」、「民族優劣」的比較性對照，繼而營造出一種帶有濃厚種族性和歧視性的文明對立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7])。

由於癩病在1940年代前的歐亞大陸十分普遍，所以它在世界史視角下的歷史意義便尤為突出。追溯源流，癩病的學名「漢生病」最先是由挪威人漢生 (Gerhard H. A. Hansen) 在十九世紀提出，然早在這個醫學名詞出現前，中國、埃及、印度、米索不達米亞等地已有類似癩病的病例。當然，在遠古年代，不同部落或國族只會埋首認識、處理、並嘗試解決這種在本地出現的「上古惡疾」，他們基本上不

會考慮到其他國度有否出現類似或同樣的問題。

隨着文明的緩緩發展，民族與民族之間開始發現他們「井底世界」以外的睦鄰，並認識到與他們相鄰為伴的「他者」；就此，傳染性疾病亦不可能再局限於某些社群或地區，癩病作為一種慢性傳染病，亦開始隨着人與人之間的廣泛接觸而變得「普及」。正如前文所述，由於民族會嘗試找出己身 (self) 與客體 (object) 的分離關係，他們也開始懷疑具傳染性的癩病是否由其他地區傳入。在他們看來，這些地區大多是比「主體」文明落後的「客體」地帶；而因為癩病在氣候燠熱、潮濕的地帶較為流行，所以中、西醫者大多堅信環境惡劣的地域就是癩病的源頭。

宋代儒醫便是因為認識到南方越文明的地方氣瘴潮濕，繼而認定南越國域為癩病之源。再加上癩病在傳統中國的知識版圖、性別版圖與文化版圖上均是一種「道德敗壞」的標示，故宋代醫者便「順理地」把癩病定位為發生在文明未及開化區域的「地方風土頑疾」。同樣地，歐洲民族亦歧視出現癩病的地區，認為癩病是中古文化的一種黑暗象徵。綜觀而言，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世界，癩病恰巧同時附帶上一種負面的文化意義，變成一種鑒別「文明」與「野蠻」的象徵工具。

及至東西交通愈趨頻繁、海外貿易一日千里的十九世紀，英國醫者高舉「熱帶醫學 (Tropical Medicine) 觀」和「種族主義」的旗幟，對世界發出一種醫學警告 (名為「帝國險境」 [Imperial Danger])，「開明理性」地細說癩病的傳染性和破壞性。然

隨着文明的緩緩發展，民族會嘗試找出己身與客體的分離關係，也開始懷疑具傳染性的癩病是否由其他地區傳入。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世界，癩病恰巧同時附帶上一種負面的文化意義，變成一種鑒別「文明」與「野蠻」的象徵工具。

按照梁氏的說法，環顧中國人感染和治療癩病的歷史，西方所謂「現代化」的過程斷非所有文明的必經道路，明清以來社會對癩病的處理，事實上與西方的防治方法成效相近。

梁氏認為，這種「歧視」和宋代以降在中國出現「入廣」、「過癩」等恐懼基本上是同出一轍的（頁114-31）。熱帶醫學觀縱然傳進清代中國，但它卻未有確切地影響中國社會對癩病的原有想法，西方對癩病的偏見其實只是在強化中國對這種煙瘴疾病原有的歧見而已。

無疑，梁氏的說法大抵補足了科克倫 (Allan Cochrane)、湯姆連遜 (John Tomlinson) 和哈爾德 (David Held) 等社會學家對西方文化廣播世界的反思。科克倫指出，縱然西方文化分別進入不同地區，但它也有受當地文化改造的可能，而不同文化甚至會反過來影響西方文化的本質，就如十九世紀一些西方醫者也會受到中國處治癩病的手法所影響一樣 (Allan Cochrane, "Global Worlds and Worlds of Difference", in *A Global World? Re-ordering Political Space*, ed. James Anderson, Chris Brook, and Allan Cochran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 6)。同樣地，湯姆連遜和哈爾德也認為全球化只是表面地同化世界七大洲的文明，事實上，各種地道文化及其箇中精髓是難以輕易被單一化的。儘管歐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其中一個主導角色，但是不同種類的各式文明同樣亦在全球文化中佔一席位 (John Tomlins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8; David Held et al., eds.,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1999], 3-10)。

從世界史的研究視角出發，西方文化在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時

期是否肩負着一個無以取替的領導身份？畢竟，這或許只是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學派的一種迷思與誤解。推而論之，殖民時代的西方列強是否在醫療領域上支配全球？影響力是否遍及亞洲？這些固有框框顯然值得我們去作出質疑。

另一方面，梁氏亦指出中國一些慈善團體在明清之際已開始對癩病的流播制訂一些監控策略，即使這些管理辦法未能有效提供嚴密的監管與治療，但至少也成功令癩病患者享有基本的生活條件，讓他們在社會邊緣中生存。事實上，明清時代的「隔離」管理與西方中古時代的「驅逐」(exclusion)、「淨化」(purification) 和「納入」(inclusion) 對策是十分相似的。

然而，在滿清覆亡後，中國出現「全盤西化」、且對中國文化全面否定的極端思想；再加上一些思想家如嚴復、梁啟超等相繼提出改造中國國民的理念 (Ralph C. Croizi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69)，強調國家要進步、要文明，便必須追隨西方的發展腳步，重踏西方現代化的里程。採用西方的醫療管理方法，摒棄中國固有的邊緣隔離，在民國初年頓時變成消滅癩病這種野蠻疾病的不二之法；中國自古以來與癩病博鬥的經驗一下子被「全盤西化」的思潮沖洗得乾淨利落。及至1920至30年代，不少政要人物包括陳果夫、胡定安等亦對「科學西藥」的成效與意義依舊信賴，有甚者更將西醫發展與國家治權、民族主義及國民建設混為一談，以西

學標準來治療癲病的正統位置亦因此進一步得以鞏固。

平情而論，按照梁氏的說法，環顧中國人感染和治療癲病的歷史，西方所謂「現代化」的過程斷非所有文明的必經道路，明清以來社會對癲病的處理，事實上與西方的防治方法成效相近，彼此分別不大；至於中國與西方列強對癲病的歧視，實際上也反映出「中華天下觀」與「西方中心世界觀」的異曲同工，兩者對於癲病與「文明」、「落後」、「他者」、「我者」關係的理解，基本上是相同的。

就「身體政治」的議題而言，由於癲病是一種「能見度」甚高的厭惡頑疾，故政府能否妥善、徹底地把

它消滅，往往便是國家現代化成功與否的標準。1949年以後，中共政權首次將癲病防治列為國家發展的重點政策，對農村癲病流播的監控亦愈趨着緊。及至1951年，中共更逐步成立「全國性的防治網絡」，大力打擊癲病在農村、城市的廣傳。而在聯合化療 (Multi-Drug Therapy, MDT) 成功研發的1990年代，癲病的流行率在中國亦得以大幅下降，中央政府遂因此以「有效控制癲病」的成就來標示其改革開放的成果 (頁177-213)。顯然，癲病斷不只是醫護人員、病人，以至社會大眾關注的病理問題；它在政治、外交領域上所盛載的意義亦是醫療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 革命概念的法理重釋

### ● 周尚君



阿倫特 (Hannah Arendt) 著，陳周旺譯：《論革命》(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英國學者加諾芬 (Margaret Canovan) 不無豔羨地稱，阿倫特 (Hannah Arendt) 從古代希臘城邦世界中找到了一個反思一切政制問題的阿基米德點，「站在這個立足點上，她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我們自以為理所當然的思考和行動方式上」(加諾芬：〈導言〉，載阿倫特著，王寅麗譯：《人的境況》[上海：上

儘管阿倫特對所有的革命多有不滿，並認為它們都是誤入歧途的虛假政治，但對於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和一種本體論現象的「革命」概念本身卻抱持着同情與敬仰。